

陳
珏
著

初唐傳奇文鈎沈

周策縱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陳珏 著

初唐傳奇文鈎沈

周策縱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初唐傳奇文鈎沉/陳珏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4(2006.4重印)
ISBN 7—5325—3971—7

I. 初... II. 陳... III. 傳奇小說—文學研究—中國—
唐代 IV. I207.4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34305 號

初唐傳奇文鈎沉

陳 珏 著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 × 1156 1/32 印張 10.5 插頁 2 字數 226,000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數: 1,501 - 2,800

ISBN 7—5325—3971—7

K · 676 定價: 25.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廠聯系 T: 66511611

重印序言

卞孝萱

將中國舊小說分爲六朝志怪、唐宋傳奇、宋元話本、明清章回小說四個大類，這是大家都同意的，但研究情況太不平衡。“五四”以來，明清章回小說始終是研究的重點，與之相較，唐宋傳奇的研究人數與成果，顯得太少。又，唐傳奇與唐律詩，並稱“一代之奇”，但研究的人數與成果，也是相去懸遠。以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爲例，每次年會上所宣讀的論文，關於詩歌者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而關於傳奇者不足百分之十。初唐傳奇的研究數量尤少，迄今未見任何一部中文的、日文的和西方語文的專著問世。普林斯頓大學博士陳珏獨具慧眼，下大功夫研究唐傳奇，已完成《初唐傳奇文鉤沉》一書，洋洋二十餘萬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讀後撰此，以表贊賞與期望。

魯迅《唐宋傳奇集》“專在單篇”，汪國垣《唐人小說》取材較廣，“上卷次單篇，下卷存專著”。二書被研究者奉爲經典，對後學有引導之功，但也有負面影響，那就是：大多數研究者的目光，局限於二書的範圍之內，只有少數研究者，能在二書的篇目之外有所增補。今陳珏博士提出前傳奇文體、唐人傳奇文體、準傳奇文體、泛傳奇文體等概念，大大地開闊了人們的視野。

具體到初唐傳奇來說，陳珏博士以《古鏡記》和《補江總白猿傳》為典型的初唐傳奇，《遊仙窟》為非典型的初唐傳奇，進行深入研究；以《梁四公記》、《晉洪州西山十二真君傳》和《唐太宗入冥記》為初唐準傳奇的代表作，與之對照研究，有相映成趣之妙。

唐人“始有意為小說”，其內容有虛有實，這已是研究者的共識。談者雖衆，大多就事論事，未能高屋建瓴，進行綜合、歸納。陳珏博士拈出“年表錯亂”、“互文用典”、“環境細節”三章法。此三章法的中心，均在於設計傳奇通篇的虛實結構，把事實與虛構，歷史與小說，重疊在一起。所謂“年表錯亂”，有地點上的，也有時間上的。傳奇作家必先熟悉其筆下所影射的人物，把一段本來平平實實的歷史，用傳奇文筆法，寫得真假難辨。所謂“互文用典”，是一種特殊的“抄”——“描紅”，在唐傳奇中，有布局、情節、段落、句式等不同層次的“互文描紅”。所謂“環境細節”，往往與“互文描紅”綜合運用，以人物的“環境細節”為基礎，用“用典”形式，“描紅”到傳奇裏去。此三章法，有時獨自出現，有時三者交相為用，以營造某種特殊的反映現實的虛構境界。這種境界中，往往有影射。《初唐傳奇文鈞沉》對於三章法的論述，是書中特別精彩的部分。

陳珏博士善於運用跨學科的方法，從文化史的角度，以歷史、宗教、藝術和考古四方面為切入點，對初唐傳奇進行探索，精義紛呈，觸目皆是。如：考論《古鏡記》中之“古鏡”，先從文獻學和思想史研究入手，說明此鏡乃書中之所有，是思想史層面上之鏡，象徵意義之鏡；又作考古學和藝術史分析，說明此鏡為世上之所無，非實用層面之鏡，考古意義之鏡。此鏡所代表的象徵意義，大致為跨越儒道，集入世出世兩種

觀念之大成。再解讀此鏡的特殊象數結構，關鍵在於“四象、八卦、十二辰、二十四氣”的罕見象數組合中。這種象數結構，僅見於武后朝。我這裏所例舉者，皆陳珪博士發前人之所未發也。

魯迅曾指出宋人傳奇始回避時事，暗示唐人傳奇有“爲時而著”的傳統。陳珪博士經過仔細研究，認爲這種傳統，實始之於初唐。《古鏡記》等六篇，與高宗、武后朝重寫歷史的時尚有關。其內容有實有虛，虛中蘊實，實中涵虛，以今影古，借古諷今。其所用的意念和筆法，超越前代，各謀新意，各擅勝場。其主旨均不在歷史，而在當代。不管是“舊瓶新酒”，亦或是“新瓶舊酒”，初唐傳奇所展示的虛構現實模式，與唐以前的各種敘事文的敘述模式，具有本質的不同。說得有理有據，引人入勝。

《初唐傳奇文鈎沉》在說到“重寫”家族史的風尚時，陳珪博士注意到：王福時整理王通遺著，與佚名創作《古鏡記》二事，“都或深或淺，或隱或顯，藏有某種功利的目的，並受此驅動”。這使我想起，陳垣在《史諱舉例》中，利用避諱學斷定王通之《元經》、《中說》爲“僞”。他以《中說》“大雅深而弘”語爲例，論曰：“一句之中，諱否不一，可見稱（溫）大雅者，循當時習慣，忘其爲避諱也。曰‘深而弘’者，開元以後，唐人已不諱弘也。即此一句，已足證明《中說》僞撰之時代，實在中唐以後。”如果《古鏡記》作於初唐和《中說》僞撰於中唐以後，二說俱能成立，則《古鏡記》的創作，與《中說》之整理（或曰“僞撰”），目的雖同，時間有先後。類似這樣的現象，有待在今後的研究中，作進一步的深入探討和闡釋。

總之，理論的建樹，研究方法的更新與多樣，是《初唐傳奇

文鈎沉》的重要貢獻。願著者鍥而不捨，由初唐擴展到盛、中、晚唐，全面開發唐傳奇這個有魅力的文學文化寶庫，取得更大的成功。請讀者相信，八十二歲的我，老眼無花，不說誑語。

是爲序。

2005 年 10 月於南京大學冬青書屋

目 錄

重印序言	卞孝萱 1
第一章 引言	1
第二章 初唐傳奇文真偽考	61
第三章 《古鏡記》中之王氏家族考	93
第四章 《古鏡記》中之“古鏡”考	158
第五章 《補江總白猿傳》“年表錯亂”考	204
第六章 《補江總白猿傳》文中所蘊道教色彩考	245
第七章 初唐傳奇文地圖之重繪	283
重印後記	326

第一章 引言

一、緣起^{〔1〕}

——20世紀研究中國舊小說的主流框架回顧

我近年研究興趣的重點，是運用跨學科的方法，從文化史的角度，以歷史、宗教、藝術和考古諸方面為切入點，來探討初唐的傳奇文。初唐傳奇文之所以引起我的興趣，源之於20世紀中國古典小說史研究的一個主流框架結構。這個結構，在相當的程度上決定了上世紀的多數學人是通過何種視角，來認識中國舊小說的發展歷程的。傳奇文在上述框架結構中佔據一個輪廓十分鮮明而內容相對模糊的位置。

眾所周知，20世紀的中國文學史家，開始採用西方文學史的理論分析框架，來觀察中國小說的發展。雖然諸家見仁見智，眾說紛紜，但大致都把中國舊小說分成六朝志怪、唐宋傳奇、宋元話本和明清章回小說四個大類，以歷史之縱，交文類之橫，勾勒舊小說從中古到近世的衍變軌跡，而成為一個約

〔1〕 本章的初稿，曾以《初唐傳奇考》為題，發表於冬青書屋同學會編《慶祝卞孝萱先生八十華誕——文史論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年），164—189頁。此次收入本書作為“引言”，經過了大幅度的補充和改寫。

定俗成的框架〔1〕。

在此框架內，四大文類發展分成兩條綫路。一條由志怪和傳奇所組成，其興盛期從六朝到唐宋。另一條由話本與章回小說所組成，其興盛期從宋元到明清。志怪、傳奇用文言撰述，篇幅小，接近於西方的短篇小說。話本、章回以白話為敘述媒介，篇幅從中等到大，接近於西方的中、長篇小說。20世紀的學術界，基本上一致認為，舊小說在文類意義上的分界綫在於敘述媒介，亦即文言還是白話的區別。這一區別，決定性地影響到小說的敘事方式、篇幅大小、內在結構，等等。於是，中國舊小說從六朝到唐、宋、元、明、清的發展，基本可以用“傳奇由志怪發展而來，章回小說則由話本發展而來”的公式加以概括。據此公式，有宋一代，遂成文言與白話小說的歷史性分野，將志怪與傳奇和話本與章回，一隔為二。

〔1〕 這個框架，在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等葦路藍縷、開風氣之先的弘著中，已經定型，極大地影響了後來的文學史和小說史的撰作。直到本世紀末，無論是章培恒、駱玉明主編之三卷本《中國文學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還是袁行霈主編之四卷本《中國文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仍然採用這個框架。中間出版的各種中國文學史，數以百十計，亦未見有能真正脫其窠臼而另闢蹊徑者。而上世紀末出版的中國小說專史，亦大同小異。關於20世紀中國文學史著述的梗概和目錄，見陳玉堂《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合肥：黃山書社，1986年）。關於中國文學史之撰寫史，參董乃斌、陳伯海、劉揚忠編之三卷本《中國文學史學史》（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中國小說史學史的研究，則參胡從經《中國小說史學史長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胡著試圖以比較文學方法，整理中國舊小說史的史學史，從章太炎開始溯源，頗有新意，但亦明顯未能脫出“四大文類”板塊的窠臼。

這個框架的來由，可以從兩方面來討論。一方面，這個框架的背後，自有中國的舊傳統在。中國治文藝者有所謂“一代有一代之文藝”的說法，不獨以小說為然，亦不獨以 20 世紀學人為然，凡論及自秦漢至近代之藝事，即常有“漢賦、晉字、唐詩、宋詞、元曲”之說〔1〕。另一方面，上述框架無疑染有極為濃厚的“五四”學術思想色彩，強調當時對文言白話黑白分明的價值判斷〔2〕。同時，上述這個公式的形成，也追隨當時文

〔1〕 本世紀伊始，學術界開始重新檢視這種觀念對文學史研究的意義。如周助初最近以清代揚州學派焦循和近人胡小石為中心，縱論在 20 世紀中國文學史編纂領域內的“一代有一代之所勝”的觀念史，有深入闡發。參周助初《文學“一代有一代之所勝”說的重要歷史意義》，《文學遺產》2000 年 1 期，21—32 頁。程毅中則在分析王國維的名言“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時，著重指出這是清末民初的學術界在進化論影響下所風行的文學史觀，見程毅中《簡述“五四”以來中國通俗小說的研究》，《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3 年 1 期，95—104 頁。

〔2〕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歷史是一種記憶，不同的記憶側面會導致對同一事物的不同角度、不同層面的闡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五四”的思想和遺產，其實遠較 20 世紀中葉的主流闡發為複雜和多面。近年來，國內的學術界對“五四”思想的複雜性的討論，已經深入到了一個層次相當豐富的層面，還其歷史本來的複雜面目，與 80 年代以前的主流學術界所描繪的那幅黑白分明的“反帝反封建”簡單化、概念化的圖案，已經不可同日而語。羅志田近年圍繞“五四”的文化歷史環境，對於與“整理國故”有關的若干具體的課題研究，即為實事求是反映“五四”思潮的複雜性的例子。參見羅志田《古今與中外的時空互動：新文化運動時期關於整理國故的思想論爭》，《近代史研究》2000 年 6 期；《從正名打鬼：民國新派學者對於整理國故的態度轉變》，《中國學術》2002 年 2 輯；《機關槍與綫裝書：從“國學書目”論爭看民初科學與國學之間的緊張》（1—3），《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 年 5、6 期及 2003 年 2 期；等。

學批評界“洋爲中用”的時尚，融會有 20 世紀前半期西方文學史撰作的思路，富於進化論的色彩。它至今仍是學術界用來觀察中國舊小說衍變的一個主流框架。

從 21 世紀初的今天來反觀這個 20 世紀的主流公式，我們感到，它的整體的佈局雖然很整齊，但內在的邏輯結構卻顯得過於簡單。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文學歷史的發展往往是非常複雜的，因而我們對文學現象的解釋，也應該採取多角度的取向，而不是單一的取向。在這一大背景下，我們有理由相信，上述的框架在 21 世紀，極有可能會出現新的變化〔1〕，儘管我們目前尚難以預測，今後這個框架會遭遇到何種挑戰，經歷怎樣的修正，是否被揚棄等等具體的路向變化。

回顧 20 世紀的學術成果，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志怪、傳奇和話本在上述框架中所佔的地位雖有四分之三，但研究成果的比例卻相當少，加起來也不及那另外的四分之一。無庸諱言，百年來，在上述框架內的四大舊小說種類中，章回小說始終是研究的重點。就國際範圍而言，無論是中（包括港、臺）、日、韓學人，還是西方漢學家，圍繞明清章回小說而發表的論文和出版的專著，汗牛充棟。與之相較，在六朝志怪、唐宋傳奇和宋元話本的研究領域，則成果在數量上不成比例。雖然這三個小說文類的研究，都代有名家，但在數量上即使加在一起，亦遠不能與章回小說研究相提並論。數量上的比例失調，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總體研究深度和廣度上的比例

〔1〕 近年國內學術界日漸感興趣的“重繪”中國文學、文化史“地圖”一說，打破原有的學科界綫的思維模式的藩籬，就是新世紀在這方面努力的開端之一。

不對等。這種不成比例的現象，不僅直接影響了人們對於章回小說以外的每一個文類的認識的深度，而且間接影響了人們對在上述框架中的中國舊小說整體發展規律的認識深度。

不難看出，就中國舊小說整體發展而言，在四大文類當中，傳奇佔有某種特殊重要的地位，其潛在意義，迄今尚遠遠沒有真正廓清。其實，傳奇文在深層意義上，是一個溝通文言與白話的潛在樞紐。例如，傳奇的“本事”(theme)多借鑒志怪，而話本和戲曲的“本事”(甚至包括部分章回小說)則多借鑒傳奇。在此意義上，傳奇是上連志怪而下接話本的一個樞紐〔1〕。人們欲知同一本事在各種虛構文類間的錯綜複雜變遷的來龍去脈，非從唐代的傳奇文入手不可。這個方面，自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譚正璧先生倡導〔2〕，經過學界的鍥而不捨的研究，歷史沿革的線索已基本清楚〔3〕。我們因之而知道，至少在“本事”方面，傳奇文的影響跨越了“五四”所設的文言與白話的人為樊籬，它不僅受到了同以文言為媒介的志怪的影響，而且廣泛而深入地影響了以白話為媒介的話本

〔1〕 這種說法偏重於研究某一相同主題在不同文類中的傳遞和繼承，由來尚矣，元人陶宗儀在其《南村輟耕錄》中所提出的“稗官廢而傳奇作，傳奇作而戲曲繼”之說，即可理解為也有這層意思。從今天的眼光看，陶說竟也與後人有進化論色彩的論述暗合，可見此乃古已有之者。如“人夢好婚”主題在六朝志怪中的《楊林》、唐人傳奇文中的《枕中記》、明代戲曲中的《黃粱夢》裏一脈相承的發展，即為一例。

〔2〕 譚正璧編《三言二拍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的出版，為這方面研究進入新階段的標誌。

〔3〕 例如，程國賦《唐代小說嬗變研究》(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

與戲文。

這說明了，在中國舊小說的四大文類中，文言體與白話體之間並沒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中國舊小說從中古到近代的發展，也絕非像如下那條約定俗成的思路——“傳奇出於志怪、章回小說出於話本”——那麼簡單、那麼公式化〔1〕。在明清成形的章回小說，實際上是一種集在它以前的志怪、傳奇、話本之大成的虛構敘事文體，是一座融會各種不同文體於一爐的熔爐。就這點而言，實在與西方 17 世紀以《唐·吉訶德》為代表的長篇小說文類的出現〔2〕，有異曲同工之妙。

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唐人傳奇文是否不僅在“本事”方面——類似西方的主題學(thematics)——對話本、戲文有直接影響〔3〕，而且在文類學(genre studies)方面，亦對於章回

〔1〕 惜乎影響深遠的“五四”新文化運動過於強調文言與白話之間的區別，帶有強烈的價值判斷色彩——文言總是僵死的和過時的，而白話則都是活潑的和符合時代潮流的。人們於是十分強調章回小說與口頭文學的傳承關係，而忽略了文言與白話在明清章回小說中的活生生交融。在 20 世紀後半葉，西方漢學界有的學者強調明清章回小說的口傳文學影響，有的則強調“明代四大奇書”為文人小說。然而，無論何家何派，孰長孰短，都是十五、二十年前的老公案了。總而言之，各種研究，色彩紛呈，尺有所長，寸有所短，不同意見正說明了學術研究的活躍和豐富性。這種豐富性，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啟發我們進一步觀察唐人小說與明清小說之間共同點，研究傳奇文與章回小說之間在文類學上的聯繫。

〔2〕 俄國形式主義批評家對《唐·吉訶德》的研究，對於我們研究明清章回小說，極有啟發性，參 Viktor Shklovsky, *Theory of Prose* (translated by Benjamin Sher). Elmwood Park: Dalkey Archive Press, 1990(該書第四章專論《唐·吉訶德》)。

〔3〕 我國傳統的“本事”研究，與現代西方所謂的“主題學”，既有相通的地方，又有不同的地方。現代“主題學”研究，源出(轉下頁)

(接上頁)於 20 世紀初葉的民間故事研究界,以德國傳統為指南,研究某一文學形象(如凱撒),或某一典型故事情境(如父子衝突),如何在不同的世紀中不斷重現與變化。20 世紀中葉開始,一批眼光獨到的批評家(包括 A. Christensen, J. Petersen, W. Krogmann, E. Frenzel 等人在內)開始擴展上述德國傳統的理論觀念的基礎,把文學中的母題(motifs)視為拼接作品的積木板塊式的文本單位元(textual building blocks),可進一步分成“期望性文本板塊”(anticipatory textual units)、“參考性文本板塊”(referential textual units)、“裝飾性文本板塊”(ornamental textual units),乃至“情境性文本板塊”(situational textual units)和“描述性文本板塊”(descriptive textual units)等等,於是乃有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湯普遜索引”(Thompson Index)之編撰,成為尋繹某一特定的母題在跨越世紀的西方文學發展中的緣起、復現、擴展和變體的有效工具。二次大戰後,在新批評(New Criticism)、社會學批評和心理分析批評潮流的影響下,當代“主題學”研究,有托鐸洛夫(Tzvetan Todorov)和列文(Harry Levin)這樣的重量級人物加盟,在歐洲和美國同時獲得深入發展。這種發展,使當代西方的主題學研究,已經早已溢出當年“湯普遜索引”時代的範圍了,而變得極其複雜。當代的主題學研究,注重揭示在某個特定的主題的特定時代發展中,作者個人的創作意向如何與民族的集體無意識互相交融,把個人的心理現實和特定的文化歷史層面連在一起。再者,當代的西方主題學研究,一方面注重揭示某一特定主題範型的選定與作家童年生活中的某種遭際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注重揭示歷史視野的變化如何影響作者和讀者對某個特定的主題的喜好程度,以確定所謂“時代坐標”(period code)的理論批評觀念。在本章第 5 頁註[2]和註[3]中,我們提到了近年學術界在唐人傳奇文的主題學研究方面的進展,但毋庸諱言,如果從國際的視野用比較文學的立場來考察,迄今為止,國人在這方面的研究,就理論層面而言,基本上還是與西方在二次大戰前的框架相仿。換言之,唐人傳奇文的“主題學”研究,如果參考國際上“主題學”研究在近年的理論發展,尚別有新生面可開。以上對西方“主題學”研究發展所作之種種簡述,主要參已故美國東西比較文學的領袖人物 Earl Miner (孟爾康)等在上世紀 90 年代主持重訂的 Alex Preminger 和 T. V. F. Brogan 原編《新版普林斯頓詩與詩學百科全書》(*The New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小說的形成貢獻良多。根據初步的研究,我認為,甚至可以這樣提出,除非把傳奇文作為一個文類的研究再推進一步,我們便無法深入看清傳奇文對於章回小說在結構(structural)和文理(textual)上的深刻影響,也無法分析藏在章回小說骨子裏的“傳奇”體。章回小說裏有“傳奇”體的說法,雖然與上述 20 世紀文學史家的主流觀念不同,卻和清末西學東漸之前人們的觀察有互通之處。隨手檢讀小說史料可知,因為其時尚無對文言與白話的價值判斷存在,明清間人談及章回小說,有時稱之為說部,有時稱之為傳奇,前者強調其與話本的關係,後者強調其與傳奇文的關係。惜乎 20 世紀的學術界,認為這是明清文人隨口而言,並無文學批評上的意義,因而對此現象未加深究。其實,欲將中國舊小說的研究在上述框架中推進一步,從傳奇入手,並不失為一條別開生面的途徑。

如前所述,比之於章回小說,20 世紀的傳奇文研究,從學者和成果的數量而言,要少很多〔1〕。因為數量少,研究的

〔1〕 20 世紀的唐人傳奇文研究,以中文著述而言,其高潮一在 50 年代之前,一在 70 年代之後,其發展的源流和概況,可以從下面所列的一份《簡目》和一篇《綜述》中略窺一斑。1912 年至 1995 年間國人、日本人和韓國人的唐人傳奇文的研究書目,見蔣宜芳《唐人小說研究論著簡目》,《中國文哲研究通訊》6 卷 1 期(1996 年),79—126 頁。此《簡目》在日、韓的論文收集方面,雖然尚有可以補充之處,但在收集國人著述時力求詳盡,對港臺的出版物幾乎有聞必錄,細緻詳盡。至於自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國內在唐代傳奇文研究方面的進展概況,則可參馮孟琦《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我國唐代傳奇小說研究綜述》,《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 年 1 期,66—73 頁。該《綜述》出自一位研究生之手,其分析和組織雖然不可避免地不時帶有稚嫩之感,但就我有限見聞所及,該文似乎是目前這方面的最新綜述,可以參考。

內容也限定在特定範圍之內。除了少數的例外，國人“五四”以來的傳奇研究〔1〕，誠如一位前輩學者之所指出，是在“考證作者生平、寫作年代；進行分類（如分為神怪、愛情、豪俠等類）；探討思想性與藝術性；進行註釋、輯佚、賞析等”的範圍之內展開的〔2〕。其中，不乏劃時代的重要著作，例如魯迅《唐宋傳奇集》〔3〕、汪辟疆《唐人小說》〔4〕、劉開榮《唐代小說研究》〔5〕、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和《唐代小說校釋》〔6〕、李宗為《唐人傳奇》〔7〕、程毅中《唐代小說史話》（後改訂為《唐代小說史》）〔8〕、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叙錄》〔9〕、李時人《全唐五代小說》〔10〕，以及周紹良《唐傳奇箋證》等等〔11〕，均在特定的領域中開風氣之先，貢獻甚巨，但研究的焦點則不出以上所列範圍〔12〕。少數另闢蹊徑者，以陳

〔1〕 這裏的“國人”，包括大陸和港、臺學者在內。

〔2〕 見卞孝萱《唐傳奇新探》（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1頁。

〔3〕 魯迅《唐宋傳奇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

〔4〕 汪辟疆《唐人小說》（上海：神州國光社，1932年3版）。

〔5〕 劉開榮《唐代小說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年）。

〔6〕 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1978年）、《唐人小說校釋》（臺北：正中書局，1983—1985年）。

〔7〕 李宗為《唐人傳奇》（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初版，2003年再版）。

〔8〕 程毅中《唐代小說史話》（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年），後改訂為《唐代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

〔9〕 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叙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年）。

〔10〕 李時人《全唐五代小說》（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11〕 周紹良《唐傳奇箋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

〔12〕 限於篇幅，以上所舉，僅見聞所及中之犖犖大者，掛一漏萬，在所難免，幸有關學者，勿以為怪。同時需要說明的是，本書中提到和有所引用的學者中，有幾位是前輩和師長，著者或曾受業或曾從遊，也有一些為著者所尊敬的老輩學者，或時有過從，或從未謀面。根據中國傳統的習慣，應該分別不同情況，在（轉下頁）